

关于俗词概念的界定

何春环 何尊沛

[摘要] 确定俗词的内涵与外延,是开展俗词研究的前提。传统词学多从雅俗之辨的角度论述俗词,认为俗词即语言俚俗的艳情词,当代学者对俗词的定义异见迭出,尚无定论。通过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可以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所谓俗词,其内涵包括题材的适俗性、表达的直露性、语言的浅俗性和审美功能的消遣性,其外延则包括民间俗词和文人俗词两类。

[关键词] 雅俗词论 俗词 民间俗词 文人俗词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2-0134-05

传统词学多以“雅”与“俗”来辨析词的艺术风格,认为俗词主要是指那些语言俚俗的男女艳情词,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则异见迭出,至今尚无定论。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

一、传统词学对俗词的论述

“雅”与“俗”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对重要审美范畴,雅俗之辨也是词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元人陆辅之《词旨》指出:“凡观词须识古今体制、雅俗,脱出宿生尘腐气。”^[1]由此认定读词之第一要义就是先辨雅俗。由于受到崇雅黜俗的传统观念制约,历代词学家对雅词论述较多,而对俗词则论述寥寥,更无明确的界说,我们拟从雅俗鉴照中来考察俗词。

“忌俗”与“尚雅”相对,尚雅是从正面立说,忌俗是从反面立论。词论中所谓“俗”者,大体上是指词作内容平俗,表达直露,语言浅俚。就内容和表达而言,如曾慥《乐府雅词序》谈及选词标准,声称“涉谐谑则去之”,而对欧阳修等人所作“艳曲”,也悉删除。^[2]可见,曾氏认定谐谑游戏之作及艳情俗曲有违雅正标准,自当归于俗词一类。铜阳居士编辑《复雅歌词》,特选骚雅之作,也尽将艳情俗曲摒弃不选。赵尊岳《填词丛话》卷二指出:“词之患在浅、俗、佻、薄,……佻者失之不厚,无论批风抹月,均以纤笔写儂姿,在背于温柔之诗教。薄者无含蓄意义,一索便尽,更何能使人三复涵泳。”轻佻言情,为风月所使,表达直露,流于淫褻,缺乏含蓄意趣,当属俗艳之词,自然在忌俗之列。张炎《词源》卷下曰:“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将辛、刘豪气词视为“长短句之诗”,一概排斥于雅词之外,显然出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观念,实属偏颇;但豪气词中一些浅易通俗的俳谐戏谑、闲散自适乃至粗豪旷放之作,往往不讲含蓄,不尚典雅,信笔写来,俚漫不经,也可划归俗词范围。现代词学家赵万里《箕颖词记》指出: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讥评曹组为“滑稽无赖之魁”,原因就在于其人“专工谑词”;而“谑词见于小说平话者居多,当时与雅词相对称,宋世诸帝如徽宗、高宗均喜其体,《宣和遗事》、《岁时广记》载之。此外尚有俳词,亦两宋词体之一,与当时戏剧,实相互为用”。由此看出,俳谐戏谑之词或讥讽嘲笑,或逗趣取乐,往往表达率露,不尚典雅,因而在宋代被作为雅词的对立面而归入俗词。张炎《词源》卷下又曰:“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雅莫难于寿词,倘尽言富贵则尘俗,尽言功名则谀佞,尽言神仙则迂阔虚诞。当总此三者而为之,无俗忌之辞,不失其寿可也”。可见,咏节序之词和祝寿之词等在内容与表达上也有尚雅与媚俗的明显区

作者简介 何春环,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博士(北京,100081);何尊沛,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南充,637002)。

别，不可不辨。

就其语言风格而言，历代词论中对俗词指责非难者甚多。两宋词人以俗受毁者当推柳永、康与之及黄庭坚等人为甚。如李清照《词论》评柳永曰：“始有柳屯田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王灼《碧鸡漫志》亦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三十九亦认为柳永《乐章集》“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这些都是就其措辞浅俚，不用典故而言。沈义父《乐府指迷》称：“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语。”彭孙遹《金粟词话》评山谷词曰：“山谷‘女边著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贺裳《皱水轩词筌》亦称“黄九（庭坚）时出俚语，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谓侗父之甚”。贺氏还提出填词三忌：“小词须风流蕴藉，作者当知三忌：一不可入渔鼓中语言，二不可涉演义家腔调，三不可像优伶开场时叙述。偶类一端，即成俗劣。”这些都说明了俗词语言趋于通俗浅俚的一些特点，与雅词的语言典雅是格格不入的。詹傅《笑笑词序》评康与之曰：“近世词人，如康伯可（与之），非不足取，然其失也诙谐。”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曹组“潦倒无成，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这又说明诙谐语、滑稽语也是俗词的一种语言，较之雅词语言乃是大相径庭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关于作词忌俗之说更为具体：“无论作诗作词，不可有腐儒气，不可有俗人气，……尖巧新颖，病在轻薄；发扬暴露，病在浅尽。腐儒气、俗人气，人犹望而厌之。”强调词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都应力求含蓄蕴藉，避免轻薄、浅露、陈腐、粗俗之弊。赵尊岳《慎词丛话》卷二亦指出：“俗有性情之俗，字面之俗。或所引之故实，不登于大雅之林。或所构之情景，无当乎风人之列。”所谓“性情”，是指词人的心性修养，亦即思想个性，俗人写俗词，则词如其人，而所引故实不雅，所写情景不正，既反映在词作“字面之俗”，更反映出词人“性情之俗”。所谓“无当乎风人之列”者，指有失雅正，无补于社会教化。

综上所述，传统词论中的雅俗之辨，主要集中于内容雅正还是平俗，是否有补于社会教化；语言婉雅还是浅俚，是否富有文采；表达含蓄还是直露，是否托兴寄意，耐人品味。我们只要准确把握这三个层面，剔除前人论词有失偏颇与片面之处，突破崇雅黜俗的传统词学观念，就能划清雅词与俗词两者的基本界限，从而在雅俗鉴照中来考辨与认知俗词。

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

近年来，由于俗文学研究逐渐掀起热潮，学者们对俗词也有所关注，但致力于俗词研究者却寥寥无几，尤其是对俗词内涵和外延的确定这一重要前提仍未妥善解决。当代学者关于俗词的定义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有的对俗词内涵不太明确，往往含糊其辞，甚至将文人俗词与民间俗语混为一谈，对其各自的特点不加分辨；有的对俗词外延的界定有失恰当，不是过宽就是过窄，甚至认为俗词就是那些描写男欢女爱的淫辞滥调，更带有极大的片面性。

胡适《国语文学史》一书曾系统讲述中国历代白话文学，其中有“两宋的白话词”专题，列论北宋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周邦彦，以及南宋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刘过、刘克庄等词人的一些浅显通俗之作，认为白话词大多是“俚语词”，“宋人白话词真可以代表那时代民间文学”。^{[3](P99-102)}但胡适所谓“白话词”，主要着眼于语言的通俗浅近，其划分范围较宽，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讨论的“俗词”。赵义山《论宋金俗词及其对元散曲的影响》一文认为“要论宋、金之俗词，当以语言风格的明白通俗、浅近鄙俚为准”，进而将宋金俗词分为四类：一是柳永等人的恋情一流，二是曹组等人的滑稽一流，三是辛弃疾等人的叹世归隐一流，四是张伯端等人的道教一流。^[4]作者纯粹从语言风格一面来界定俗词，当源出胡适“白话词”之说。李昌集《北宋文人俗词论》一文提出厘定俗词的三个标准是：（1）把秦楼楚馆如实地引入词作，多把妓女作为词的主角，词中充溢着一股市井气息；（2）不着意比兴之意，将男女心境真切、率直地表露；（3）运用世俗的语言词汇。^[5]此说将俗词完全局限于艳俗妓情之类，不免存在将文人俗词单一化的缺失，但从内容、表达方式和语言三个层面来立论，这对研究唐宋文人俗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田耕

宇《“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一文认为俗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 承继了《花间集》中写艳情、乃至色情的传统，但其中市民意识中的糟粕成分更加浓厚，平庸低级比花间有过之而无不及。(2) 所谓谐谑之作，或写市井间的街谈巷闻，或插科打诨，或作文字游戏，无论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还是美学情趣都不足取。(3) 俗词大多是以市井人物的口语写成，其中不乏通晓明白者，但鄙俗无味，缺少文学性，纵然是那些有名文人所写的作品，也难脱此弊。^[6] 这种归纳并不全面，认为俗词只包括艳情和谐谑之作，将俗词范围划得过于狭窄，而对其文学价值也大有贬低之嫌。这显然沿袭了崇雅黜俗的传统词学观念，难免有曲解俗词内涵和外延的偏失。

划分俗词的范围，其实并非只是包括“艳情”与“谐谑”（亦称“俳谐”）两类，也非“都不足取”。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论述北宋末年的俗词创作丰富多彩时指出：“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作家队伍十分广泛，上至御用词人、皇帝近臣，下至在野士大夫、释道神仙、民间下层。触及的社会面也十分广阔，或感慨个人得失，或针砭社会现实，或矛头直指徽宗君臣，或友人间互相戏谑取乐，或宣扬宗教的出世之情。这一切对南宋形成以俗词讥讽、批判现实的创作传统，有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俗词创作从内部细致分类，又可以从俚俗中独立出‘谐谑’一类。这类作品寓庄于谐，生动活泼，更富民歌风味。”^{[7] (P227)} 赵成林《俚词的文学功能和内容特征》论述了俗词题材的世俗化特征，认为：“与主流文学言志载道的功用不一样，俚词主要是用于娱乐消遣的这一特质决定了俚词在题材内容上也与正统诗文有别，即它一般不涉及严肃的、经典的文学题材，而是采用日常世俗的情和事，经典性题材即使进入俚词，也会受到其文体特征的制约而发生变化，即化庄为谐。”^[8]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论及辛弃疾俳谐词，认定“抗金英雄辛弃疾在失意隐居的时候写了俳谐体或带有俳谐意味的词大约60来首，占其词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他这类词，真可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举凡揭露官场黑暗、嘲骂士林群丑、斥责衰世末俗、描绘市侩心理、宣泄政治牢骚，以及表现山林隐逸之乐，活跃亲戚朋友关系等内容，在他的俳谐词中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又以批判社会现实、抒写愤世嫉俗之情的作品最有锋芒，最有特色”。^{[9] (P307)} 葛兆光《论朱敦儒及其词》又标举了表现隐居生活的闲适俗词，认为宋词可分为雅词与俚词两类，其俗词“在内容上固然比较消极，只是他这一时期明哲保身、希求闲适、追悔往日的生活基调的表露，但在艺术风格上却是一个突破”。^[10] 赵义山、彭天发生《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专题论述了辛弃疾俗词的生活化与多样化特征，认定“这些俗词，从平俗驳杂的内容、叹世归隐的题材倾向、自然通俗的语言特色、明言直叙的表达方式，以及调侃戏谑、幽默诙谐的趣味等方面来看，都与南宋雅词大异其趣”。^[11] 以上诸位学者所论较为中肯，基本符合唐宋俗词创作实际，值得我们在界定俗词的内涵与外延时加以借鉴。

三、唐宋俗词创作的多样化

先就唐宋民间俗词而言，其题材尤为多种多样。(1) 从敦煌曲子词来看，有的描写战争和边塞生活，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望远行》（年少将军佐圣朝）等词，刻画了将士为国征战，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有的描写征夫与思妇的悲欢离合，如《忆归云》（征夫数载萍寄他邦）、《破阵子》（年少征夫堪恨）等词，刻画了征妇独守空闺、魂牵梦绕的思夫心理；有的反映少数民族和边地人民的心声，如《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望江南》（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等词，抒写了敦煌人民不甘屈服狼蕃，期盼国家统一的迫切愿望；有的反映下层民众的婚恋情爱生活，如《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抛球乐》（珠泪纷纷湿绮罗）等词，写出了青年男女爱恋的执着和失恋的痛苦；有的表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诸如参加起义的农民、为国拓边的将士、刻苦攻读的儒生、孤苦寂寞的思妇、漂泊异乡的游子、垂钓溪上的渔翁、潇洒闲适的隐士、勇猛威武的豪侠，以及工匠、医生、道士、僧徒、商人、旅客、五陵年少、青楼歌妓等等；有的表现色彩斑斓的民俗风情，诸如信仰民俗、婚姻民俗、服饰民俗、岁时节日民俗、游艺娱乐民俗等等。(2) 从宋代民间俗词来看，其内容更多地反映了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充分地展示了绚丽多彩的市井风情，突出地表现了奢靡享乐的市民意识。有描写市井女性的情感世界者，如《生查子·闺情》（闲倚曲屏风）写怀春少女的情窦初开，《踏莎行》（殢酒情怀）写恋爱女子的复杂心理，《转调贺圣朝》（渐觉一日）写闺中少妇的相思苦痛，

《檐前铁》(悄无人)写薄命弃妇的血泪诉说,《菩萨蛮》(昔年曾伴花前醉)写守节寡妇的忠贞不渝等;有描写世俗男性的情感世界者,如《与团圆》(绞绡雾縠)写青年男子对心仪女子的暗恋心理,《御街行》(霜风渐紧寒侵被)写多情男子对所恋女子的相思愁绪,《鬲玉案》(年年社日停针线)写漂泊游子的思乡情结,《行香子》(清要无因)写求宦士子的科场失意,《咏遇乐》(功名闲事)写落第文人的出世思想等;有描写市民阶层的娱乐生活者,如《踏青游》(识个人人)写市井男子的冶游狎妓,《卜算子令》(我有一枝花)写市民消闲的猜拳饮酒,《恋绣衾》(元宵三五酒半醺)写元宵观灯的热闹景象,《阮郎归》(门儿高挂艾人儿)写端午佳节的民俗风习,《满庭芳》(十二香皮)写宋代流行的蹴鞠游戏等;有描写市民异类的丑态劣行者,如《减字木兰花》(家门希差)讥刺皇家宗室赵葫芦,《一剪梅》(宰相巍巍坐庙堂)抨击南宋朝廷丈量土地,《鬲玉案》(钉鞋踏破祥符路)嘲讽热衷科举的寒酸士子,《夜游宫》(因被吾皇手诏)刻画僧人头戴德士冠的滑稽形象,《行香子》(浙右华亭)揭露奸商欺骗顾客的丑恶行径等。这些,都凸显出了宋代民间俗词的市民文学特征。

再就唐宋文人俗词而言,其内容虽然不及民间俗词丰富广泛,但也并非全是艳俗题材,仍旧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1)从唐五代文人俗词来看,有佑酒佐欢的酒令词,如李景伯《回波词》(回波时酒后)、唐玄宗《好时光》(宝髻偏宜宫样)等;有写民风土俗的民俗词,如刘禹锡《竹枝词》、皇甫松《采莲子》等;有描绘南国风光的写景词,如白居易《忆江南》、欧阳炯《南乡子》等;有抒写男欢女爱的恋情词,如韦庄《思帝乡》(春日游)、冯延巳《长命女》(春日宴)等;有抒写相思愁苦的伤别词,如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牛峤《感恩多》(两条红粉泪)等;有关注风尘女子的歌妓词,如尹鹗《清平乐》(芳华妙妓)、孙光宪《浣溪沙》(试问与谁分最多)等。诸如此类,大多属于俗人俗事,俗情俗调,具有较为浓郁的民歌风味。(2)从宋代文人俗词来看,其题材内容又有新的开拓。北宋文人俗词主要发展了晚唐五代词中艳情一类题材,诸如“骀馱从俗”的柳永俗词,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反映了歌妓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对爱情生活的渴望与追求,表现出强烈的女性平等意识;“翻旧曲,写新声”的欧阳修俗词,善于描写女性的意态风情和心理感受,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民间女子的形象;“褻谑不可名状”的黄庭坚俗词,多关乎“批风抹月”的男女情事,多叙写狎妓艳遇和离思别恨,体现了“不妨随俗暂婵娟”的创作观;秦观等人的《调笑》转踏词,联章演绎前人小说或民间流传的奇闻轶事,强化了俗词的叙事功能;还有北宋文人的俳谐词,自陈亚发端,苏门词人继有创作,到北宋后期蔚成风气,或逗趣取乐,或自嘲遣兴,或讽谕劝谏,内容广泛,表达自由,打破了文人俗词以艳俗题材为主的狭隘局面,从而增强了俗词的现实性、趣味性 with 多样性。(3)南宋文人俗词更加世俗化、平民化、生活化,其内容题材也更加多样化。南宋不仅有以描写传统艳俗题材为主的作家,如赵长卿、石孝友、蔡伸、吕渭老、向滄、程垓等,也有描写退隐闲居生活者,如朱敦儒、周紫芝、辛弃疾等。受南宋祝寿民风的影响,有许多词人创作了浅近通俗的寿词,如魏了翁、郭应祥、刘辰翁等;有宣扬释道思想的俗词,如张抡、沈瀛、葛长庚等人之作;有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叙写,如刘过、刘克庄、刘仙伦、戴复古等人之作;有反映遗民生活与特殊心态的俗词,如刘辰翁、蒋捷、仇远等人之作。诸如此类,均是以前文人俗词中没有或少有涉及的内容,这是南宋词人对俗词题材的开拓和创新,其中尤以朱敦儒、辛弃疾的俗词创作成就特别突出。朱敦儒俗词多用浅俗的口语白话与率真直露的表达方式,写诸如吃饭睡觉、饮酒喝茶、种花垂钓、走村串户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表现了世俗情味与平民趣尚,从而拓宽了文人俗词的创作天地。辛弃疾俗词内容繁富,题材广泛,其生活化、浅俗化、多样化的特点最为突出。其中既有对离愁别恨这类传统题材的表达,也有对乡村山居生活的描摹;既有对世间百态的揭露嘲讽,也有对身边琐屑情事的记述。诸如写景、纪游、咏物、怀古、讽世、嘲人、赠别、祝寿、迁居、开池、饮酒、读书,以及乡村习俗、田园风光、儿女家事、朋友交往等等,大凡生活中所有者,稼轩俗词几乎无一不备。辛弃疾以平民的心态来观察自然万物,以浅俗的词笔来描写闲居生活。其山水词,如《丑奴儿近》(千峰云起)写博山道中所见夏日雨后美景,表达了“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的心愿;其田园词,如《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写农家五口的安乐生活,洋溢着浓郁清新的乡土

气息；其祝寿词，如《謁令》（更休说）庆贺族姑八十寿诞，以“见底道，才十八”赞颂其青春不老，以“十字上、添一撇”祝愿其千岁长健，语言生动活泼，令人不禁莞尔；其家事词，如《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向儿女唠叨家常，吩咐缴纳科税、计划收支等家庭琐事，读之亲切有味；其纪游词，如《鹤桥仙》（松冈避暑）写夏日山行所见怪石飞泉等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丰年婚嫁的热闹场面，将寻常之景物与情事摄入词中，给人以清新质朴之感；其饮酒词，如《沁园春》（杯汝来前）写词人戒酒，竟然与酒杯对话，取散文句式，以议论入词，写来颇有喜剧色彩；其伤别词，如《鹤桥仙》（轿儿排了）写送侍妾粉卿远行的离愁别苦，抒发了“莫嫌白发不思量，也须有思量去里”的深切依恋之情；其诙谐词，如《钗头凤》（厄酒向人时）运用诙谐戏谑的白话口语，嘲讽那些圆滑狡狴、俯仰随人、巧言令色、八方讨好的卑鄙小人，可谓嘻笑怒骂，涉笔成趣；其感悟词，如《行香子》（归去来兮）感慨世人争名夺利，贪图富贵荣华，嗟叹人生短暂，莫如及时行乐，表达了老来“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的愤世思想。辛弃疾的俗词创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实绩，足以代表唐宋文人俗词的最高成就。

总而言之，唐宋俗词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充分反映了广阔的社会人生与复杂的现实生活，无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文学价值。^[12]因而俗词之“俗”，并不等于庸俗、粗俗、卑俗、鄙俗；相反，我们应当彻底打破崇雅黜俗的传统词学观念，重新建立一种俗词不俗、俗中有雅、雅中有俗、雅俗共赏的新型词学观念。

四、俗词的内涵与外延

至此，我们可以为俗词正式确立一个定义。所谓俗词，是指广大民众（包括一些雅俗共赏的文人）所喜爱的，富有世俗生活气息与平民风味，讲究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无须强求合乎诗教规范，平铺直叙而绝少托兴寄意，通俗浅近而不求典雅精深的词作。它在题材内容上具有适俗性，在表达方式上具有直露性，在语言风格上具有浅俗性，在审美功能上具有消遣性。——这就是我们界定俗词内涵所作出的结论。

俗词的范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民间俗词，即由平民百姓（包括民间文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所创作出来的直言其事、直抒其情的词作，它与《诗经》、汉魏六朝乐府一脉相承，具有典型的民间文学特质，是一种原生性的俗文学；另一类是文人俗词，它是由文人士大夫从民间俗词中吸取养料而仿效创作出来的一种浅俗生动、具有俗文学特征与意蕴的词作，大略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拟乐府诗歌，是一种再生性的俗文学。文人俗词的创作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俗为俗，即模仿民间俗词以叙写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表现出完全俗化的特征，如柳永、黄庭坚等人的俗词多属此类；一是以俗为雅，即用俗词的体式来叙写文人士大夫的世俗生活，带有一定的雅化倾向，如朱敦儒、辛弃疾等人的俗词多属此类。——这就是我们界定俗词外延所作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 [1] 唐圭璋. 词话从编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本文所引词话资料见于此书)
- [2] 金启华等. 唐宋词集序跋汇编 [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 (本文所引序跋见于此书)
- [3] 胡适. 国语文学史 (两宋的白话文学) [M]. 胡适文集 (第8册) [Z].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4] 赵义山. 论宋金俗词及其对元散曲的影响 [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1993, (5).
- [5] 李昌集. 北宋文人俗词论 [J]. 文学遗产, 1987, (3).
- [6] 田耕宇.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3, (3).
- [7] 诸葛忆兵. 徽宗词坛研究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 [8] 赵成林. 俚词的文学功能和内容特征 [J].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 (3).
- [9] 刘扬忠. 唐宋词流派史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 [10] 葛兆光. 论朱敦儒及其词 [J]. 文学遗产, 1983, (3).
- [11] 赵义山, 彭天发生. 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 [J]. 中国韵文学刊, 2005, (1).
- [12] 何春环. 唐宋词俗研究 [D].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6.

责任编辑: 陶原珂 王法敏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Largest Peninsulas in China

Zhang Zhengsheng, Zhou Yongzhang and Zhang Linying 80

After introduc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three peninsulas in China, this paper compared their economic survey, development level and spee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al effect. It includes that their strategies of regional economic localization, national investment and reg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 promote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largest peninsulas.

On the Guangdongese View of Geomantic Ome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Focused on Local Interests and Social Disputes

Wu Jianxin and Zhong Haiyan 98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feudal officials and the gentlemen in the lead, the activities of Feng Shui were flourish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lans and gentlemen used the knowledge about Feng Shui to control the limited local resources, and to defense their interests. They also made use of the knowledge of Feng Shui to set the boundaries of living and interests which might bring disputes of resources i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induced social unrests and endless disputes.

Rereading Marx 's Literary Criticism in Multiple Viewpoints

He Chunhuan and He Zunpei 134

Well defining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Ci Poetry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study of popular Ci poetry. But the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given some so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he popular Ci poetry. So, we in the paper study the refined and popular theories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art, sum up the comments about Ci poetry seriously, according to the texts of folk popular Ci poetr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especially those kept at Dun Huang, and compare it with the creative practice of scholars at that time. And so that, we can give a proper definition of popular Ci poetry based on their feature of language, expression way, and subjective tendenc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tension and extension of Ci poetry, clear away the conceptual confusion and give a reasonable answer for that.

New Lexical Phenomena in the Pro-contemporary Chinese, Based on Four Kinds of Modern Historical Data

Liu Xiaomei 139

During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culture to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 a large number of new words and new meanings appeared. The transitional phenomena, such as polyonymous phenomenon, the short existence of archaic meanings and so on, are very complex. These are obviously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 A Collection of the Past Treatie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 ' Historical Data of Opium War '(book 1-5), and ' the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 and ' Haiguotuzhi '(海国图志) . The modern historical data should not be ignored for their importance in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exical history. With the new research, we a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the early time of modern Chinese lexical history or 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uld be set in the 19th centur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urriculum

Zeng Wenjie 144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curriculum refer to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curriculum and culture, and the ideas, theories and thoughts based on knowing about those interrelations, which constitute the facts and theories on which curriculum relies fo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dimension.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curriculum and culture contribute to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curriculum. To construct and develop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curriculum,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ne core issue of value, two key issues that refer respectively to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factors affected curriculums, and they focus on nine points: scientism, excellence, equity, rural education, the reconstructing of moral society, crime and legality, family needs, the joining of public societies, and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they also concern other three domains as cultural study, sociology and curriculum politics.